

「鞍型期」與概念史

——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

方 維 規*

摘要

科塞雷克的「鞍型期」之說，指稱歐洲從早期近代走向十九和二十世紀，從前現代走向現代的「過渡時期」。他所宣導的概念史，試圖從語言視角把握現代世界，以概念變遷給「鞍型期」之說提供依據。德國學派的概念史研究同社會史密切相關，注重社會事實和變遷、時代的實際經驗以及歷史語境。現代概念不僅是時代的表徵，也是推動歷史的因素，並具有時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識形態化的特徵。十九世紀這一萌生「全球性」的時代，也是東亞的巨大轉折期。西方影響和東亞「接軌」的一個明顯特徵是概念的傳輸。鑑於東亞過渡期之「不同時歷史的同時性」或「同時歷史的不同時性」，亦鑒於概念的含義見之於用法，發展一種東亞國家的「比較概念史」和一些關鍵概念的「運用史」是極為有益的。

關鍵詞：「鞍型期」與概念史、現代概念的生成和特徵、
東亞的概念現代化

* 作者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The “Saddle Period” and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with a Discussion on Concepts from East Asia’s
Transitional Period

Fang Weigui

Abstract

The term “saddle period” that was introduced by Reinhart Koselleck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early Modernity and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i.e., the passage from pre-modernity to modernity.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which he regarded as both possible and necessary, seeks to comprehend the modern world from a semantic perspective. By pointing out the change in meaning of existing concepts, Kosseleck sought to make evident the existence of a “saddle period”. “*Begriffsgeschichte*” as pursued by the German School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ocial history. It pays attention to social reality and the changes it undergoes, to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reality that is documented in a given period, and to historical contexts. Modern concepts are not only indicators of their time but factors that actively shape history; they contain features such as temporalization, politic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potential ideologizati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rking the emergence of globalization, brought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to East Asia as well. An undeniable indication of Western influence and East Asian adaptation is the transfer of concepts. In view of the “simultaneity of non-simultaneous history” and the “non-simultaneity of simultaneous history” observable during the East Asian period of transi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r meaning attributable to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development of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oncepts focusing on East Asia and a history of key ter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s necessary.

Keywords: “Saddle Period”, Begriffsgeschichte, 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modern concepts, modernization of concepts in East Asia

「鞍型期」與概念史

——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

方 維 規

一、科塞雷克：「鞍型期」與概念史

在過去十多年中，西方「概念史」這一跨學科研究方向又一次重整旗鼓，並被運用於人文科學的不同領域。提倡概念史的一切嘗試，都旨在為失去後勁的文化研究尋找出路。這些嘗試的共同點是，尋求概念史在新的理論語境中的適用性和實用性。概念史在史學研究中的目的是，藉助概念理解歷史。概念史試圖回答一系列直接關乎史學科學性的問題：為何有必要一再重寫歷史？如何將已被闡釋的、流傳下來的歷史想像引入今人意識的視野範圍？西方概念史重點考察的術語史，其時間跨度為歐洲政治青春期，起始於中世紀晚期的少不更事，終結於一些共和國民主的誕生；而對語言根源的推究，常會追溯到古代理論家，其中首推亞里斯多德。

歷史哲學家和科學理論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不僅敘述歷史，而且知道為何敘述、如何敘述。他借用「鞍型山體」（*Bergsattel*）意象，即連接兩座山峰之間的低落過渡地帶，提出了西方史學中著名的「鞍型期」（德：*Sattelzeit*；英：*saddle period*）概念，指稱過渡時期或時代界線，故而亦有「界線期」

(*Schwellenzeit*) 之說，即西方近代早期與現代之間的界線，時間約為啟蒙運動晚期至法國大革命前後。¹

法國大革命被看作歐洲「漫長的十九世紀」的開始，「舊制度」(ancien régime) 被推翻，也在歐洲其他地區引發突變，1789 年至 1848-1949 年的歐洲歷史亦被稱作「革命時代」。就時人的時代意識和時代經驗而言，完全也可以見出一種「時代革命」。當然，與「漫長的十九世紀」相關的，還有十八世紀後 30 年開始的英國產業革命；新技術使機器代替了人力，生產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工業化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生活的轉型。「雙重革命」所帶來的巨變，²意味著歐洲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並發生於歐洲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實，早在 1789 年前的幾十年，當歐洲傳統農業社會起步走向現代工業社會之時，社會和政治中的許多機構已經改變了性質。同時，市民階層的知識者開始質疑貴族的社會和政治主導地位。這一切都是科塞雷克「鞍型期」理論的歷史基礎，他的「鞍型期」概念的時間範圍約為 1750 年至 1850 年。³

¹ 西方史學界一般將法國大革命前的 1770 年前後的社會發展視為早期近代的結束和走向現代的出發點。霍布斯鮑姆 (Eric J. Hobsbawm, 1917-) 所說的「雙重革命」，是指政治—社會革命和經濟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工業』本身的巨大勝利，而且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巨大勝利；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勝利，而且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的巨大勝利；不僅僅是『現代經濟』或『現代國家』的勝利，而且是世界上某個特定地域（歐洲部分地區和北美少數地方）內的經濟和國家的巨大勝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顛和法國這兩個毗鄰而又互為競爭對手的國家。」參見霍布斯鮑姆著，王章輝等譯：《革命的年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

² 亦有學者將大西洋兩岸的兩場革命（法國大革命和十八世紀下半葉的美國革命）以及英國產業革命視為「鞍型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記。

³ 源於法國的話語史研究也將重點放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間的過渡期，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於 1960 和 1970 年代發表了一系列歷史研究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望診的考古》(Naissance de la clinique)、《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和《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Les mots et les choses)。這些著述的中心論點是，所謂發端於啟蒙運動並一直延續至今的

一種經典的歐洲歷史分期是「古代—中世紀—近代」三分法，中世紀同近代的分水嶺一般定於 1500 年前後，以印刷術的發明、殖民擴張的開始以及宗教改革為主要特徵。科塞雷克引入「鞍型期」概念的意圖是，豐富和深化歐洲歷史分期，強調啟蒙運動的精神啟迪，以及各種革命給老歐洲帶來的巨大震撼。在以 1800 年前後的歷史發展為時代分界的過渡時期，對政治體系和概念結構來說都至關重要，歐洲社會、人的氣質和日常生活向現代轉向，一些現代價值觀也是在那個時期首次提出，並作為典範流傳後世的。它在根本上已經塑造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歐洲亦即西方。在那個時代，現代人和現代西方誕生了。⁴

「鞍型期」理論是科塞雷克在其主編的八卷本大辭典《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的「導論」中提出的。這一概念最能彰顯出他的學術思想視闊，並且，他要以概念變遷給「鞍型期」之說提供依據。

歷史編纂說到底也是視角問題。科塞雷克試圖藉助許多哲學和歷史概念來探究時人的感受，這使他看清歐洲歷史在早期近代之後的加速發展，發現「鞍型期」與過去之間深深的裂痕，以及這一重要過渡時期的語言變化和現代語言的形成。十八世紀中期以降，歐洲的許多概念危機四伏，傳統語言中的詞語和用法經歷著範式轉換。「鞍型期」開啟了國民意識、民族國家和工業社會。變化了的社會和經濟範式，

西方個性解放的進化之路並不存在。他將目光投向各種具有認識論意義的革命，其結論是：現代科學範式（即人是關鍵認識對象的範式）絕非西方發展之水到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認識突變。

⁴ 關於這段歷史，郭廷以亦有類似論述：「十八世紀，再加上十九世紀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兩朝加上嘉慶朝和道光前期，是歐洲歷史進步最速，變化最大的時期。產業革命，交通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哲學政治經濟科學上的新理論，新思想，新發明，蜂湧而起，日新月異，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質均與過去大大的不同。我們試約略一覽這個期間西方的重要成就及其發展，即可了然，這些成就均係對於人類的精神及物質生活具有偉大的支配力量。」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頁 7-8。

亦導致概念的意義變化，如「民主」、「共和」、「革命」，以及後來的「階級」。開始發生深刻變化的一個標幟，便是公共領域中的許多概念也在變化。同時，其他一些往昔的重要概念（如「貴族」或「等級」），逐漸失去原有的意義。「名譽」或「尊嚴」等概念超越了個體或等級層面，被運用於民族國家或國族和人民的現代語境，舊概念得到新解。舊詞語和表達或退出歷史舞臺，或增添了新的含意，且保留至今。「現代人」已經熟知那些詞語的蘊含，無需再像對待許多中世紀術語那樣，唯有「轉譯」才能領悟。⁵根據科塞雷克的「概念解剖」，那些進入現代門檻的「鞍型期」基本概念，脫離了往昔的經驗空間，拓展出新的期待視野。不僅如此，「概念史」研究本身也在1960年代呈現出認識上的期待視野：誰懂得解讀概念，誰就能夠窺見現代社會之秘密的運動規律，並從語言視角把握現代世界。

當初，傳統「觀念史」的缺陷，導致德國、英美和法國的歷史研究對語言和話語分析（「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的濃烈興趣。在科塞雷克從事概念史研究的同時，英美學術界、尤其是普考克（J. G. A. Pocock, 1924-）和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40-）為代表的劍橋學派，亦日益重視語言與歷史的關係。⁶將不同的方法學探

⁵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ed.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XIII-XXVII.

⁶ 參見 Quentin Skinner,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3, no. 2 (Winter, 1972), 398-408; Quentin Skinner,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State of the Language*, ed. Leonard Michaels and Christopher. Ric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562-578; Quentin Skinner, “Languag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ional Change*, ed.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Cambridge: CUP, 1989), 6-23; James Tully and Quentin Skinner eds.,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3 (Cambridge: CUP, 2002); J. G. A. Pocock, “Virtue and Commer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 (1973/74), 119-134; J. G. A. Pocock, “Verbalizing a Political Act: Towards a Politics of Speech,” in *Language*

討進行比較，馬上就能見出對話的困難。德國學派在不忽略共時考察的同時，更注重歷時考察。普考克在同科塞雷克的一次直接交流中，推重共時研究模式，對話語分析的評價高於對概念史的評價，也就是政治話語史高於概念變遷史。另外，普考克反對科塞雷克在《歷史基本概念》中對「鞍型期」之1750年至1850年的籠統的年代劃分，認為英國政治和社會語彙的「鞍型期」為1500年至1800年。普考克的思考直接導致比較分析，他認為必須觀照話語前提：不管是概念史還是依託於話語前提的研究模式，都是「歷史的，文化的，民族國家各具特色的」。⁷當然，科塞雷克本人在總結其研究方案時，並沒有無限抬高「鞍型期」的方法學功用，或視之為概念史研究之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他看來，「鞍型期」的設定對概念史方法本身沒有決定性影響。這不僅涉及德語區的研究方法，也涉及其他語區的話語分析。尤其是前現代因素的頑固性與新概念的碰撞，即傳統和新近闡釋因數的疊合，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過程，必須避免刻板的時代界限，共時比較的歷時分析才是有意義的。⁸

科塞雷克和斯金納幾乎同時開始對歷史上重要年代的概念梳理，他們的出發點也是對傳統觀念史所號稱的觀念獨立性和延續性的批判。然而，二者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來自他們不同的政治和歷

and Politics, ed. Michael J. Shapiro (Oxford: Blackwell, 1984), 25-43; J. G. A. Pocock,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étier d'historien: Some Considerations on Practice," i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Anthony Pagden (Cambridge: CUP, 1987), 19-38.

⁷ J. G. A.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58.

⁸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59-70; Melvin Richter, "Opening a Dialogue and Recognizing an Achievement. A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9 (1996), 19-26.

史背景以及不同的思想影響。帕洛嫩（Kari Palonen，1947-）認為，科塞雷克所代表的是一種「時代理論的語言方案」(*zeittheoretische Sprachkonzeption*)，而斯金納則宣導「修辭的時代方案」(*rhetorische Zeitkonzeption*)。⁹換言之：科塞雷克的「鞍型期」之說，更多地規定了概念變遷的宏觀考察，而斯金納則更喜於探討較短時段中的概念含意變化。

無論如何，科塞雷克的許多概念，不管是「鞍型期」還是「經驗空間」、「期待視野」¹⁰等概念，幾乎成為當今歷史學家和相關參考書中不可或缺的語彙。本文的論述重點也是科塞雷克的理論，以及一些與之相關的學說。

二、社會，經驗，語境

科塞雷克的「語言轉向」，首先根植於特定的德國傳統，尤其是德國精神史傳統。由他主持編撰三十多年之久的《歷史基本概念》，堪稱嚴謹的概念考古豐碑。「歷史基本概念」不僅呈現歷史上的概念界定，而且竭力重構與之相關的經驗場域。概念也有歷史，概念史的

⁹ 參見 Kari Palonen: *Die Entzauberung der Begriffe. Das Umschreiben der politischen Begriffe bei Quentin Skinner und Reinhart Koselleck* (Münster: LIT, 2004), 15.

¹⁰ 科塞雷克認為，「經驗空間」(*Erfahrungsraum*)是積澱著往事的今天，「期待視野」(*Erwartungshorizont*)則指向未知，只可推測不可體驗；換言之：「經驗空間」連接過去，「期待視野」面向未來。沒有經驗就沒有期待，沒有期待亦無經驗可言，當代則是過去與未來的連接點。「經驗空間」與「期待視野」的能動關係是延續歷史意識的保證。在史料研究的基礎上，科塞雷克斷言，人們的「經驗空間」和「期待視野」之間的差距在「鞍型期」之後越來越遠，未來不斷地讓基於經驗的設想失望。可是，從伏爾泰、康德到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卻都有過美好的希望：不管是進化還是革命，一切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349–375.

考證客體、基礎材料和探討範圍不再是觀念，而是概念。¹¹因此，概念史始終同具體作者和文本、學派和傳統保持一定的距離。鑑於歷史永遠是呈現於語言、沉澱於概念的歷史，概念史試圖通過對語言表述之意義變化的分析，讓人領悟過去時代的實際經驗與社會形態及其變化的關係。

概念與事實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這是科塞雷克一再探討的問題。他早在《歷史基本概念》卷一的「導論」中就已指出，概念史方法的指歸「既不是詞語史也不是事件史，既不是觀念史也不是問題史。概念史自然會借助於這些研究方向，但它首先是歷史的、批評的。」此時，詞語史當然是「一個切入點，因為所有考察都得先從那些表述政治和社會重要事實的詞語入手，或者，它們蘊含著相應的經驗、思想或理論胚胎。」¹²此時，一方面要甄別原始材料並釐定語境，另一方面要區分語言史和概念史：語言史分析詞語，概念史探討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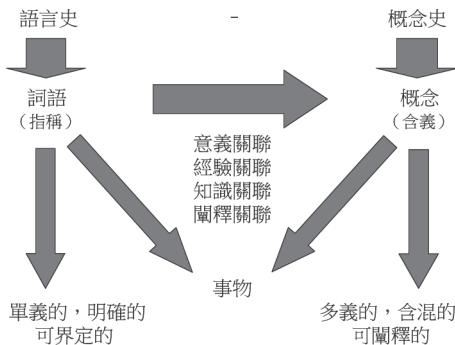
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方案對「詞語」和「概念」作了區分，儘管這一區分對語言學、符號學和認識論來說都是成問題的。在他看來，雖然概念和詞語相互關聯，但是概念作為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詞語，是區別於「一般詞語」（「純粹詞語」）的「特殊詞語」。¹³「一個詞的含義總是指向意指之物，無論是一種思路還是一種情形，或者其他什麼東西。儘管含意附著於詞語，但是詞義也來自口頭或書面語境，同時源於它所指涉的情境。如果所用之詞的意義關聯全都融合進該詞，它就變成概念。概念附著於詞語，但它不只是詞語。」如此看來，概念與一般詞語不同，它是「（不同）歷史現實之多種含意之聚合，並融入詞

¹¹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XIII-XXIII.

¹²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X.

¹³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110.

語。……詞義可以通過定義來準確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闡釋。」¹⁴「多義性」是科塞雷克判定「概念」的標準，它可能與一些詞語的多種義項有關，但它不認可約定俗成的定義，它指向實際經驗和經驗關聯。顯然，科塞雷克的「概念」不屬於語言學範疇，而是思想範疇和分析範疇，是闡釋歷史現實的方法。與語言語義學所設定的前提不同，概念史視「概念」為歷史現實中的經驗與期待、觀點與闡釋模式的聯體。概念是相關概念中的概念，不觀照其他概念便無法理解單一概念。¹⁵



「考證概念及其語言史跡，是認識歷史的最起碼的條件；釐定概念與人類社會有關。」¹⁶於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便向起始於啟蒙運動的社會史靠近。鑑於歷史不可能脫離社會和語言而存在，概念史便把自己看作廣博的社會史的一部分，至少與社會史密切相關。語言分析是社會歷史考察之必不可少的部分，其研究對象便是社會變遷和語言變遷的互動關係。¹⁷作為一種方法，概念史同社會史的結合至

¹⁴ Reinhart Koselleck,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der Neuzei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1 (1967), 86.

¹⁵ Hans Erich Bödeker, “Reflexionen üb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Methode,”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ed.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86, 88-91.

¹⁶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9.

¹⁷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107-129.

關緊要。繼《歷史基本概念》之開創性的研究之後，又一部概念史巨制、十五卷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1985-2000)，試圖把握從法國舊制度到復辟時期的政治和社會概念。該著將概念史方法運用於另一個歐洲國家的歷史和社會研究，綱領性地聯繫法國「鞍型期」(約從 1680 年至 1820 年)，拓寬了與社會史相結合的歷史語義學。德國學派的研究表明，概念史和社會史的兩個維度能夠呈現經驗範圍：經驗只有在歷史中才是可能的，可被描述的，也可能對社會現實產生影響。

一種行為的意義已經預設在它的語言命名之中，並只有在其語言兌現中才能被理解。當然，概念必須先以陌生的面目出現，然後才能讓人看到它是如何產生和被人認識的。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方法，旨在從概念的意義（含意）變化入手，釐清過去時代的歷史經驗，「鞍型期」之說便是詮釋過去經驗的理論。那個時期巨大的政治風暴、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使現代政治思想中的關鍵概念（如「國家」、「公民」、「家庭」、「自由」、「共和」、「革命」等）發生了深刻的語義變化，一些新概念（如「帝國主義」、「共產主義」、「階級」等）得以產生。這種概念含意的變遷或新概念，來自新的生活狀況、新的人與環境、社會與時代的關係：新時代的新人需要新的語言。

概念史開闢了通向經驗史的途徑，概念的語義嬗變緣於變化了的歷史和時代經驗，新的認識首先將歷史發展視為「變化」和「運動」。於是，政治主導概念的含意不再是以往那種靜態的、超時代的概念，它們獲得了面向未來的前瞻性內涵。概念時常走在事件的前頭，預見或讓人感到後來的事件。這裡說的是現代西方的那些典型的「催生經驗的概念」(*Erfahrungsstiftungsbegriffe*)，它們不是對經驗的回溯和記載，而是藉助概念的語義來預設將來。我們在此可以看到事實在先、概念在後與概念在先、事實在後兩種現象，它們分別體現「真實」歷史同概念生成之不同的時間順序。也是在「鞍型期」，柏拉圖(Plato, 427B.C.-347B.C.)和亞里斯多德之後對貴族政體、君主政

體、共和政體的通常劃分，基本上已經萎縮成兩種形態，前二者在廣大人民眼裡沒有本質區別。在歐洲古代和中世紀時常涵蓋各種國家形態的「共和」概念，後來同「民主」緊密相關。政治概念要在改變了的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就必須重新界定其含意。

過渡社會的一大特徵，是人的經驗以及與之相關的解釋方法的惶惶急變。傳統經驗模式的變換，伴隨著對新的經驗模式的尋找，並有意義地把握經驗變化。在這種經驗解釋中，語言解釋形式具有關鍵意義。比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語言在人們理解和把握急劇的經驗變化時獲得了新的能量。1789年之後的經驗，讓時人感到許多傳統概念越來越不合時宜，並逐漸生發概念之時代性的意識。科塞雷克在其豐碩的歷史研究中（他的最大成就在於個案研究），縝密地考察了時代意識如何在「鞍型期」發生了變化。以1789年為分水嶺，不同時代經驗的疊合和發酵，緣於傳統概念的橋樑作用，它在某種程度上將概念之新舊含意的對接帶入新的經驗空間。闡釋模式的變化，蘊含著人們對深刻的社會和文化斷裂的意識，告別過去、面向未來的當代獲得了新的品質。

其實，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對歷史語義學的理論思考也能讓人知悉，他對社會的「語義」分析也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話語分析一樣，並不關注語義「表層」，而是生成表層的結構。¹⁸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是「婚姻」概念，它的神學依據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被人類學認識所替代，並逐漸成為淡化法律拘囿、注重愛情和道德的行為。幾百年來，「婚姻」概念的語言外殼並未變化，但是它的語義結構和與之相關的語言實踐發生了變化。漢譯西洋概念中的許多「舊詞新義」亦即「舊形新義」也是很典型的，例如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1827-1916）譯《萬國公法》（1864），用先秦時期已經使用的「權利」來移譯“right”，刪略了原文

¹⁸ 參見 Urs Stäheli: “Semantik und/oder Diskurs: ‘Updating’ Luhmann mit Foucault?,” *kultuRRevolution*, 47 (2004), 14-19.

中有關個人自主性權利的內容，只注重國家的合法權力和利益，該詞便以這一含意進入中國政治語彙。時至1900年前後，個人權利才被看作不可或缺的內容進入「權利」概念。¹⁹不管是盧曼還是科塞雷克，他們都竭力在歷史文化研究中同傳統的思想史保持距離，並努力開創一種思想社會史。²⁰從這個意義上說，概念史真正謀求的是「語境化」，以達到對政治和社會歷史的新認識。

科塞雷克十分關注「語境」。他所宣導的「概念史」，旨在觀念的語境化，關注概念在歷史語境中的社會意義之生成，探尋一些特定概念（「基本概念」）為何得以確立，維繫著什麼樣的想像天地，排斥、遮蔽或揭示什麼，誰以何種意圖將之納入政治話語，它們如何在公共領域走紅，如何成為政治和社會術語，並包含何種未來設想。這裡所說的概念史，從來不只是概念的歷史，不只是概念的發展本身，不只拘囿於文本，不只單單鉤稽概念的演變，而是力圖挖掘概念的語義結構，通過考察語境來確認特定概念的建構能量。任何新詞或概念，都不可能不從當下的或傳承下來的語境中獲取意義。它更多地關注政治和社會事實與其語言兌現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概念史當被理解為結構史。

科塞雷克晚期理論探討中的概念史觀點簡要而鮮明：與所有史論一樣，概念史也需要假設，沒有假設就沒有論點可言。純粹的史料堆積絕非概念史，關鍵是把握概念網絡中的大概念、下屬概念、對立概念等各種概念之間的關係，以揭示概念的內在語義結構。唯其如此，才能彰顯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構能量，否則無法真正理解文本或語

¹⁹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起源和演變〉，《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99-145。

²⁰ Hans Erich Bödeker, “Ausprägungen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n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11.

境。²¹ 正因為此，科塞雷克在其晚年也或多或少地同「概念史」名稱保持一定的距離，如伯德克（Hans Erich Bödeker，1944-）所描述的那樣：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是「通過語言生成意義的歷史」，而不是概念的歷史。²²

三、「複合單數」與現代概念的「四化」

「鞍型期」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許多「中心概念」的誕生，即某些概念從其多樣性（複數）向單一性（單數）的過渡，科塞雷克稱之為「複合單數」（德：Kollektivsingular；英：collective singular）。「歷史」概念便是一個很好的「單數化」例子：各種各樣的事件、經歷和發展過程，造就出自成一體的建構品——「歷史」，這一複合單數是抽象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結果。換言之，許多事件和歷史被聚合、濃縮和抽象為「歷史」，它將「不同時歷史的同時性亦即同時歷史的不同時性集於一個概念」。²³ 科塞雷克的研究標明，「歷史」這一充滿意識形態的「複合單數」已經在1780年成型；此前的「歷史」概念雖未消逝，但在十八世紀獲得了新的闡釋空間。與「許多」歷史不同，「歷史」是一個認識概念，它不僅涉及歷史事件及其關聯，而且總是伴隨著闡釋。於是，「歷史」的語義發生了變化，並獲得兩種含意：「歷史總和」和「歷史反思」。「歷史」概念在被當做政治論據時，得到了徹底擴展。同樣，《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48）開篇所說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疑也是「複合單數」的典型事例：如果人們

²¹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531-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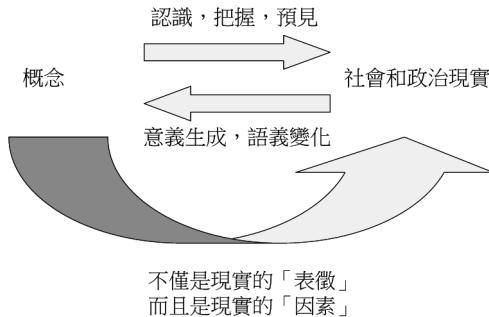
²² 參見 Hans Erich Bödeker, “Ausprägungen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n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 14.

²³ 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2, 595.

還像前現代那樣把「歷史」看作一個複數概念，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說法則是荒唐的，因為以往一切社會的歷史並不都是階級鬥爭史。然而，這一複合單數卻是高度理論化、極具挑戰性的概括，它連接經驗和期待，與以往歷史無多關聯，卻是社會關係如何變化的「表徵」。這裡也能見出複合單數這一語言現象在發展新的行動綱領時所具有的能量。「階級」概念原先只是用來「劃分」的中性表述，但在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之社會模式的語境中獲得了新的含意。此時，舊詞獲得新義，這會導致語言運用以及政治和社會之經驗空間的改變。為新的社會分層而進行的鬥爭與「選詞」之爭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為將來而進行的語義鬥爭。

在科塞雷克眼裡，概念從來不只是供歷史學家解讀時代變遷的純粹「表徵」(Indikator)；概念還是承載歷史、推動歷史的「因素」(Faktor)。換言之，這裡所說的概念不是描摹，而是描述各種「世界」；概念是多義的，因而往往是有爭議的。如同「進步」、「自由」等概念，甚至連「歷史」概念本身，它們都是歷史發展的「表徵」和「因素」。科塞雷克堅信語言的塑形能量，事件或歷史不但被融入概念，概念也直接塑造歷史。同「歷史」概念相仿，在今人眼裡已經是理所當然的那些「複合單數」，如「自由」、「平等」、「解放」、「革命」、「進步」、「人類」、「社會」等，都是在歐洲十八世紀中期之後的社會和政治強震期產生的，是世事變遷的「表徵」和「因素」。對歷史編纂學意義上的概念史來說，重要的是在歷史「中心概念」的意義及其變化中找到某個時期之歷史意識的佐證，尤其需要關注的是那些推動歷史的語言之意義發生巨變的年代。「只有在對語言作為表徵和因素的雙重把握中，概念史方法才會生成其特有的研究領域。」²⁴

²⁴ Heiner Schultz, “B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e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45.



以上述幾個概念為例：「自由」曾指很具體的自由，後來被賦予最起碼的平等，或曰人人自由的理念，「平等」在「自由」概念中有著決定性意義。「平等」曾是一個很具體的概念，後來成了一句口號。「解放」則變成一個歷史哲學概念，與「進步」密切相關，且不只指具體的進步，還可用於歷史的進步。這些概念在「鞍型期」之語義變遷後的含意，在前現代是無法理解、難以想像的。於是，人們會在不同語境中根據自己的理解來運用一些抽象概念，使其意識形態化，或者一再作出新的闡釋。現代概念是很容易被沾染上意識形態的。

在政治話語中，人們在建構一個世界的同時，也在建構一種語言。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公民」概念，是市民社會謀求解放進程中的鬥爭概念。此時，政治概念不再只是描述性的，人民（而不只是「政治哲學家」）對政治概念的運用，使其獲得了訴求的意蘊，它們成了目的明確的政治認同。這是「鬥爭概念」、「行動概念」或「目標概念」產生的土壤。如前所述，概念時而也會預見歷史，就像「公民」(*citoyen*) 概念所顯示的那樣：狄德羅將“*citoyen*”概念收入《百科全書》，把它同「資產者」(*bourgeois*) 區分開來。可是直到法國大革命之時，這個概念才在「公民卡佩」(*citoyen Capet*)²⁵ 那裡獲得有血有肉的內涵。對同一個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該概念所具有的不同品質，

²⁵ 1793 年，也就是在法國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被改名為路易·卡佩的前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

體現出不同社會的需求和追求。通過考證原始材料，可以甄別概念的真正含意。例如：如果我們考察法國、德國或英國的「公民」（法：*citoyen*；德：*Bürger*；英：*citizen*）概念，考察它們各自在實際運用中包含何種附加意蘊和何種想像，便可發現極大的差異。

以上論述中可以見出，基本概念一般都走過由「前政治」含義經「政治化」到「意識形態化」的發展階段。對科塞雷克來說，「現代性」及其語言表述，具有影響社會和自我意識的四大特徵，或曰「四化」：(1) 時代化 (*Verzeitlichung*)，即特定概念顯示出「歷史哲學」走向、時代特性和發展過程，並包含期待因素。(2) 政治化 (*Politisierung*)，即社會的多元化，使概念和術語增加了語言操縱的可能性，口號式的概念時常帶著期待和目標的內涵。(3) 民主化 (*Demokratisierung*)，即政治制度的變遷，導致政治和社會重要概念之跨越階層的廣泛接受，導致概念之影響範圍的擴大；等級制度的解體，淡化了概念內容的等級特色，使政治語言和術語從貴族走向廣大民眾，而不只是集中於少數知識階層的人；另外，特定概念對不同社會成員的重要性發生偏移。(4) 可意識形態化 (*Ideologisierbarkeit*)，即概念之不斷增長的抽象程度，使之成為各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並不斷將一再擴展的政治和社會概念用於各種論戰。在以上「四化」中，民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尤為突出。²⁶

誠如科塞雷克的老師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曾經指出的那樣，所有政治概念、想像和詞語都有論戰性，總是針對其對立概念而存在的。²⁷ 在「鞍型期」各種社會集團的稱呼中，我們可以見到各種描述社會陣營的對立概念，比如「貴族」和「民主派」，還有更極端的稱謂：「革命派」和「反動派」。這些對立概念至今還在發

²⁶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der Neuzeit”, 81-99;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XIII-XXVII.

²⁷ 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ext von 1932 mit einem Vorwort und drei Corollari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3), 31.

揮作用。科塞雷克的最後一部著作《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n*, 2006) 的副標題「政治和社會語言的語義和實用性研究」²⁸，最能體現詞語含義和詞語運用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對概念的「含意偏移」(*Sinnverschiebungen*) 的深入探討。以「人民」這個抽象概念為例：確定「人民」之屬性有著完全不同的形式，誰屬於人民或不屬於人民，充分體現出一個事實，即對概念的爭奪也是對話語權的爭奪。

四、全球視野中的東亞轉型期及概念現代化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和奧斯特哈梅爾（Jürgen Osterhammel, 1952-）在他們的著述中，試圖勾勒世界史中相當於科塞雷克「鞍型期」概念的「分水嶺」。二者拋棄了以往的歷史編撰範式，告別了前人的歷史敘事傳統，採用跨學科、多層次的洲際觀察方法，從世界史的角度刻劃和分析一個時代：一個在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發生巨變的時代，一個萌生「全球性」的時代。

劍橋大學史學教授貝利在其《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全球關聯和比較》中，試圖描繪一部近代晚期的世界史，把這「短短的」134年看作世界的巨變期。他的追求是，探討和闡釋世界不同地區的歷史之間的關聯和相近之處。他分析了全球現代性的形成和漫延，詳實地展示出十九世紀歐洲的發展，已經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宗教、經濟、政治、社會緊密相連；現代世界的誕生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多中心的）、同時又是相互關聯的過程。他描述了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之間的相互影響，非歐洲社會不只是現代性之被動的接受者或無聲的證人，而是積極的參與者。²⁹

²⁸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²⁹ 參見 Christopher Alan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

德國康士坦茨大學史學教授奧斯特哈梅爾的《世界之變：一部十九世紀的歷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2009)，以歷史編撰學的慎重來描寫和闡釋全球發展，令人信服地展現了十九世紀這一全世界走向現代的決定性歷史時期，以及這個時代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時人的感受。儘管十九世紀歐洲急劇的社會發展是其考察的中心和起點，然而，作者不斷觀照世界其他地域，特別是歐洲在東亞、美洲、中東和東南亞的影響，以及這些地區和國家的歐洲接受和「接軌」。中國、日本、美國從邊緣走到前臺，尤其是1860年之後歐洲內和歐洲外的發展進程被納入共時考察的視野。³⁰

顯然，人們可以在世界語境中考察「鞍型期」這一歐洲時代變遷概念，是否也適合於闡釋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這些地區或國家是否也經歷了相似的時代分界。的確，在新近的歷史和文化研究中，「鞍型期」概念時而也被轉用於（歐洲之外）其他社會和文化巨變時期。「鞍型期」的意思，不是給馬匹上鞍、整裝待發，而是表示從前現代走向現代的分水嶺。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可以用來解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和整個東亞，儘管這裏的歷史發展沒有「鞍型山體」那樣的意象可言，而且過渡期在時間上明顯存在滯後現象：科塞雷克所說的歐洲「鞍型期」(1750-1850)的結束，可被視為東亞之偉大轉折期的開始。

就中國而言，王爾敏指出：「自一八四〇至一九〇〇的六十年間，是醞釀近代思想一個重要的過渡時代，同時也是一種獨特的思潮發展段落。這裏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會、萌芽、蛻變的過程。思想的創發，有加速趨勢，也就是說一直維持著擴張的動力。」³¹時

³⁰ 參見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Beck, 2009).

³¹ 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1。「過渡時代」是清季許多知識者的一個共識，如梁啟超所言：「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梁啟超：〈過渡時代論〉（1901），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

代和思想的覺醒，主要源於中西接觸，源於「時勢之日急，外力之壓迫，新知之瞭解，對人之模仿」。³² 在這個過渡期或轉型期，「求變求新」是廣大知識者尤其是維新人士的共同心聲。對中國和其他亞非拉國家來說，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西化。當然，晚清知識者並沒有提出「現代化」概念，而只是講洋務、自強、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³³

就像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轉型期只是一個大概劃分一樣，東亞國家（中日韓）的現代轉型也是如此。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貝利和奧斯特哈梅爾所論及的東亞社會走向現代的決定性時期，以及上文關於中國過渡期的論述，都或多或少適合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的中日韓發展狀況，儘管這三個國家的現代性體驗有先後之分，且對「近代」和「現代」的時間劃分也有出入。在這個數千年來的大變局亦即特殊的「現代性」歷史過渡期或轉型期，西方影響和東亞「接軌」的一個明顯特徵是概念的傳輸和接受，或曰「概念現代化」。漢語中的大量近代新詞，本身就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按照科塞雷克的概念史假設，不同時代的人正是通過概念來描述他們的經驗、期待和行為的。此時，我們一方面可以發現1861年以後中國所創制的新概念，很能表達時人對時局的理解傾向，如「變局」、「夷務」、「洋務」、「利權」、「商戰」、「富民」、「自強」等，這些中國「獨有」的概念，既不同於中國古代，也不同於西方近代。³⁴

另一方面，在千載未有之變局中，更有大量西方概念的移譯，也就是二十世紀初被稱作「新名詞」、「文明詞」或「譯詞」的那些概念，日本則稱之為「新漢語」。西方本土創制概念或者舊概念的新

³² 冰室文集》之六（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27。

³³ 王爾敏：〈清季知識份子的自覺〉，《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150。

³⁴ 參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附錄：〈「現代化」的時代意義及其精神基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77-278。

³⁴ 參見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14-22。

解，與翻譯概念的情形是不同的，不同的經驗、語境和想像會或多或少地產生理解上的差異。同時，西方概念本身經歷過前後變化，舊詞新解或新造概念有其自己的歷史，翻譯概念不可能將其語義全盤移植、毫無差別，它是一種融會和同化。只要是翻譯就會走樣，譯者只能追求最大近似值。移植的西方概念，常會成為我們自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提供了新的闡釋空間。比如，不少重要漢譯政治概念的形成，「幾乎都經歷了『選擇性吸收』、『學習』、『創造性重構』三個階段。」³⁵

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的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翻譯西方概念（術語和抽象辭彙等），³⁶基本上是以漢字形式來實現的，或以漢字為基本元素，這就產生了漢字文化圈的許多「同形詞」，它們是「共創、共用的產物。中國和日本是主要的創造者，朝鮮半島、越南等參與了共用。」³⁷然而，「中日流向詞」（中→日）、「日中流向詞」（日→中）或「中日互動詞」（中→日→中），³⁸不一定具有同樣的語義結構，體現同樣的經驗空間和期待視野。一個翻譯概念從中國到日本，或從日本到中國，其含意在傳輸和理解過程中可能或必然發生變化。另外，翻譯外來概念的兩種常見方法，即「譯」和「借」的方法（譯者遜也，借者襲用其音），「對於中日的譯詞創造者們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心理重量」。³⁹中日韓三種語言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同形詞，在於歷史上某個時期發生過大規模的語言接觸和辭彙交流。「近代新詞的形成並非一個國家、一種語言之間的事件，而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

³⁵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11。

³⁶ 「漢字文化圈」所包括的國家和地區是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

³⁷ 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2。

³⁸ 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頁26-29。

³⁹ 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頁29-37。

如何用『漢字』這一超語言的書寫符號來接受西方新概念的問題。」⁴⁰ 東亞概念史的國際性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種跨洲跨國的研究。尤其是漢字文化圈的同形詞，增加了東亞概念史比較研究的獨特性。當然，同形詞概念同西方不少國家共有的、多少可以相互匹配的那些概念有著相似之處。

時人對各種關鍵概念的闡釋模式，體現出東亞各國過渡期的危機經驗和社會結構之變化。這裡也能見出不同的時代經驗和未來期待，不管見之於特定概念還是具體行動。只有在回顧多樣的現代性經驗時，才能覺察一些歷史現象和重要概念的思想連續性。對各國概念及其運用的系統比較，亦可能發現一些迄今沒有提出的問題，並認識一些新的問題。這種做法或許能夠避免概念史中的唯名論，也就是不假思索地將某些（同形詞）概念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前提，是東亞國家總體上相同的轉型之路，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且不僅表現於轉型的不同時性。中日過渡期的發展狀況，最能體現科塞雷克論述「歷史」概念時所說的「不同時歷史的同時性」或「同時歷史的不同時性」，這種情形尤其見之於特殊過渡期。因此，對不同歷史語境的忽視，可能混淆不同的過渡形式以及接受西方知識的模式，遮蔽同一個概念之間的區別，或者不對等概念之間的語義差別。

概念史鉤稽過去的社會，考察那些儲存於語言材料以及文化和社會之思維結構的東西，藉助概念和話語來領會過去的歷史，檢視儲存於概念的社會史經驗。這種看法可被視為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將之運用於東亞概念史研究，自然要對其有效性甚至合法性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並看到「移植」這一方法的價值和可能的局限。我對借鑑概念史方法及比較視野中的東亞概念史之總體看法是肯定的，且基於如下思考：

首先，我們應當承認（如前所述）世界範圍的「現代化」之總體

⁴⁰ 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頁22。

趨向是「西化」這一事實，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從器物到制度到思想對西方的接受，⁴¹ 亦能見出「西化」脈絡。中國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延誤是一個不爭的事實；⁴² 並且，同是東亞國家，日本和中國的西化不可同日而語。所謂西方影響和東亞「接軌」，本身就存在巨大落差。但這一切並不排除西化的事實存在。這不是在宣揚西方價值的普世性或西方現代性的本質化，這是實際歷史發展。這也不是在抹煞各種文化的特殊性，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西化之路，各種本土特色和現代性體驗的形態差異或變異是一個常數。無疑，這裡也不否認保守文化意識亦即傳統綱常名教在二十世紀前的中國主流文化的統治地位，或者各種中西調和的理論思想，如「運會說」、「西學源出中國說」、「托古改制論」、「廣貴因論」、「中體西用論」。⁴³ 中國的西化是一個漸進過程。

其次，概念史之於歐洲「鞍型期」，東亞新概念之於東亞「轉型期」，二者有著相通之處。與其說東亞概念史注重西化因素，毋寧說概念嬗變與「轉型期」密切相關。在這個時期，「西學」的譯介不僅使東亞的近現代知識劇增，也極大地豐富了近現代漢語學術辭彙。現代漢語（尤其是科技和學術用語）很多重要辭彙與概念均產生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還有許多辭彙也是在這個時期發生了質變。此乃阿薩德分析阿拉伯語時所指出的一種現象：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大部分非歐洲語言，都在翻譯歐洲語言文本的過程中改變了模

⁴¹ 梁啟超把中國學習西方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鴉片戰爭之後「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因而有了洋務運動；第二期從甲午戰敗到民國初年，「是制度上感覺不足」，因而有了戊戌變法；第三期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因而有了新文化運動。參見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43-45。

⁴² 參見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3-25。

⁴³ 此處各種調和理論，參見王爾敏：〈張之洞與晚清中西調和之思想〉，《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72-81。

樣，並向歐洲語言靠近。⁴⁴ 同歐洲許多基本概念一樣，許多漢語重要概念在「轉型期」獲得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現代含意，而變化正是來自西方的影響。⁴⁵ 我們無需「翻譯」便可知道 economy 或 *économie* 意義上的「經濟」，而不再是「經世濟民」。⁴⁶ 當然，概念史研究絕不意味著，以今天的知識預設和習慣概念理解來解讀過去，而是挖掘特定概念的歷史語境和歷史語義，以此來認識歷史；亦可在概念演變的層面上考察其同「當今」之可能的聯繫。另外，概念史是解讀歷史的一種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第三，翻譯（接受）西方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介紹和解讀西方事物、價值觀和理想，領略西方知識及知識形態。但是「同樣的」概念，比如「civilisation—文明」，或「science—科學」，或「democracy—民主」，或「republic—共和」，由於不同甚至殊異的歷史現實，它們在概念原產地和接受地的實際認知層面和程度、歷史地位、作用和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例如，這些概念在傳入中國之時，並沒有即刻成為（科塞雷克所說的）現實的「表徵」和推動歷史的「因素」，中國有自己的社會現狀和特定的話語體系。某個重要概念在某時引入中國，並非一定緣於實際需要，它甚至是偶然的。儘管「橘逾淮而爲枳」⁴⁷ 不可避免，但是，視之為一種追求也未嘗不可。我們不能忽略這些概念的「漫延效應」（spread effect）和後發之力，即它

⁴⁴ 參見 Talal Asad, “Übersetzen zwischen den Kulturen. Ein Konzept der britischen Sozialanthropologie,” in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ed. Eberhard Berg und Martin Fuchs (Frankfurt: Suhrkamp, 1993), 323-324.

⁴⁵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附錄二：〈百個現代政治術語詞意彙編〉，頁 479-571。

⁴⁶ 關於「經濟」譯名，參見方維規：「『經濟』譯名溯源考——是『政治』還是『經濟』」，《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3 期，頁 178-188；方維規：「『經濟』譯名鉤沉及相關概念之釐正」，《學術月刊》2008 年第 6 期，頁 136-146。

⁴⁷ 參見賀照田：〈橘逾淮而爲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國近代史〉，《中華讀書報》，2008 年 9 月 3 日。

們對東亞社會文化的衝擊力和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力。以 *democracy* 和 *republic* 為例：二者在十九世紀進入中國以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基本上是同義的，時人沒有刻意用漢語明確區分這兩個概念，更何況洞達其真正含義；⁴⁸ 可是「共和」概念到了辛亥革命時期，成了「表徵」和「因素」，獲得了巨大的支配力，革命的成功被看做「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實現。⁴⁹ 同樣，「民主」和「科學」概念直到五四時期才成為戰鬥旗幟。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清末民初主張變革的中國士子所經歷的一個重要範式轉換，是向西方「文明」看齊，這個集「表徵」和「因素」於一身的西方歷史哲學概念，在中國成了一個理想概念。⁵⁰

以上三點肯定不是從事東亞概念史研究的全部理由，但卻可以讓我們看到，以東亞國家各具特色的過渡期或轉型期為背景，對一些關鍵翻譯概念（比如「文明」，「民主」，「自由」、「權利」、「革命」、「公民」、「義務」、「個人」等）的歷史語義進行系統考察，並對特定概念的引進時段及其理解進行比較研究，能夠見出經驗巨變的多元性，並更好地認識東亞國家不同的過渡期，以及各自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不同過渡方式。政治和社會辭彙在過渡期的演變，亦能折射出以往經驗闡釋的多樣性，以及人們如何通過概念來表述挑戰，尋求應對挑戰的途徑。社會史和概念史必然具有「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維度。作為一種比較範式，共時性事件與歷史性結構之間的關聯性，即共時的語義分析和歷時的系統比較相結合，不僅可以呈現東亞語境中概念移植和闡釋及其引進和輸出的路徑，也可以確認不同歷史經驗的時間範疇。

⁴⁸ 參見方維規：〈「議會」、「民主」、「共和」等概念在十九世紀的中譯、嬗變與運用〉，《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2輯，頁59-86。

⁴⁹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260-268。

⁵⁰ 用梁啟超的話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爾勃興。中國苟自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于文明耳。」「地球既入文明之運，則蒸蒸相逼，不得不變。」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1896），《飲冰室文集》之一，頁109。

亦即先後關係。

我們需要一種比較視野，查考東亞過渡期以及相關概念之統一中的多樣性，即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在其《哲學研究》（1953）中所探討的「含意即用法」或「用法中的含意」。含義見之於運用亦即用法，只要概念、含意、用法之間的關係還沒被弄清，「概念史」試圖藉助語言探索歷史經驗和社會知識的嘗試，始終存在無法擺脫傳統「觀念史」的危險。傳統觀念史常將「概念」和「含義」混為一談。正是這種應當糾正的作法，常會導致傳統觀念史的復興。⁵¹ 傳統觀念史誤將觀念視為「一成不變」的東西，與之截然相反，「概念史……考證特定語言在特定情境中的運用，以及特定話語運用者發展和運用了哪些概念。」⁵² 「概念史對『純粹詞語』與含意豐富的『概念』的區分基於一個見解，即對一些概念之運用史的考察，理應多於考察其他概念。……在制定概念史方案時，也應在某種程度上把含意在交往互動中的實現過程看做考察原則。」因為「得知一個詞語的運用，便知道其在交往中的效用，更確切地說，就能理解它的『含意』」。⁵³ 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一種東亞國家的「比較概念史」並考察一些關鍵概念之不同的「運用史」，雖然極為複雜、相當費力，但卻是極有意義的。

（責任編輯：林秋萍）

⁵¹ 參見 Hans Erich Bödeker, “Reflexionen üb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Methode,” 98, 102.

⁵²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2; 另參見 Hans Erich Bödeker, “Reflexionen üb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Methode,” 116.

⁵³ Hans Erich Bödeker, “Reflexionen üb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Methode,” 102, 106.

徵引書目

- 方維規：〈「經濟」譯名溯源考——是「政治」還是「經濟」〉，《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頁178-188。
- 方維規：〈「經濟」譯名鉤沉及相關概念之釐正〉，《學術月刊》2008年第6期，頁136-146。
- 方維規：〈「議會」、「民主」、「共和」等概念在十九世紀的中譯、嬗變與運用〉，載《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2輯，頁59-86。
-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之六九，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27-32。
- 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之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06-111。
-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39-48。
-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3-25。
- 賀照田：〈橘逾淮而爲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國近代史〉，《中華讀書報》，2008年9月3日。
- 霍布斯鮑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著，王章輝等譯：《革命的年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 Asad, Talal. "Übersetzen zwischen den Kulturen. Ein Konzept der

- britischen Sozialanthropologie,” in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Herausgeber Eberhard Berg und Martin Fuchs. Frankfurt: Suhrkamp, 1993.
- Bayly, Christopher Ala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
- Bödeker, Hans Erich. “Ausprägungen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n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erausgeber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 Bödeker, Hans Erich. “Reflexionen üb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Methode,”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erausgeber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 Koselleck, Reinhart.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 Koselleck, Reinhart.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it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D. 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 Koselleck, Reinhart.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 Koselleck, Reinhart.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erausgeber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u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 Koselleck, Reinhart. “Geschicht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 Band 2, Herausgeber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u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5.
- Koselleck, Reinhart.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der Neuzei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1, (1967).
- Koselleck, Reinhart.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 Osterhammel, Jürgen.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Beck, 2009.
- Palonen, Kari. *Die Entzauberung der Begriffe. Das Umschreiben der politischen Begriffe bei Quentin Skinner und Reinhart Koselleck*. Münster: LIT, 2004.
- Pocock, John.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it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Washington, D. 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 Richter, Melvin. "Opening a Dialogue and Recognizing an Achievement. A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9, (1996).
- Schmitt, Carl.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ext von 1932 mit einem Vorwort und drei Corollari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3.
- Schultz, H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erausgeber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 Stäheli, Urs. "Semantik und/oder Diskurs: 'Updating' Luhmann mit Foucault?" *kultuRRevolution* 47 (2004).